

中法关系史

杨元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法关系史

杨元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法关系史/杨元华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5995-0

I. 中... II. 杨... III. 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

IV. D82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7093 号

责任编辑 赵人俊 齐书深

封面设计 王小阳

中法关系史

杨元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368,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5995-0/D·1038

定价 30.00 元

前 言

中法两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中间相隔万水千山,时差约 8 小时。在古代车马舟楫不便的情况下,交往十分困难。十七、十八世纪以后,由于商业的繁荣、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东方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传到了法国,而法国精湛高超的科学技术也随之传到中国,两国间一度掀起了文化交流的小高潮。这种交流,对中法两国文明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自英国侵略者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并强迫已过了巅峰时期的清王朝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法国侵略者也步英国人之后,趁火打劫,于 1844 年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中法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黄埔条约》,使两国间的关系一下子被推上了极不平等的地位。从此,一个竭力要保持和不断扩大自己从不平等条约中攫取到的权益,以至不惜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一个开始还不甘屈辱,企图反抗,但到后来不得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一再丧权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在不同的战线抵抗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中法两国不平等关系有所改变。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国政府跟随美国,长期无视中国的存在。直到 1964 年 1 月,在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的亲自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西方大国。从此,中法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2004 年是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160 周年、中法两国建交 40 周年。应该承认,在前 100 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统治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不佳的,那是一个依仗着坚船利炮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侵

略者形象。但这一页已成为过去。在两国建交后的 40 年时间里,由于中华民族已经取得了彻底独立的地位,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尽管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不同,但在两国人民、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曾经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大国间和平共处的典范。

中法两国政府在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看法。两国都认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两国都反对任何其他大国干涉本国内政,也不愿屈从于其他大国的意志;两国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后,中法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近几年来,两国在反对“单边主义”、重视发挥联合国作用、发展中欧和亚欧关系、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共识。特别是在两国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中法之间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两国友好关系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部中法关系史,与中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关系史一样,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泪史,又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史,是崛起后的新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国平等交往的历史。当代的中法关系又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相处的典范。历史对现实有借鉴作用,不珍视历史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愿这本书能在我们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做出一份绵薄的贡献。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中法两国的最初交往	001
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001
二、两国文化交往的初次高潮	004
三、鸦片战争前的中法贸易	008
第二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法外交	011
一、鸦片战争中的法国对华政策	011
二、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	012
三、中国土地上的法租界	013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法外交	018
一、法国发动战争的借口“马神甫案”	018
二、屈辱的《中法天津条约》	021
三、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	024
四、清政府派遣赴法的第一个使者是 “道歉使者”	031
五、引进法国技术创办福州船政局	034
第四章 中法战争	037
一、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和黑旗军抗法	037
二、清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040
三、马江海战和保卫台湾	043
四、北圻大捷和中法停战条约	048

第五章	法国侵略势力步步深入中国	051
	一、中日战争和法德俄三国干涉还辽	051
	二、法国势力步步深入我国西南地区	055
	三、法国强租广州湾的交涉	059
第六章	民国初期的中法关系	063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法国对华政策	063
	二、天津人民反对强占老西开的斗争	066
	三、中国劳工在法国“参战”	070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法关系	074
	一、耻辱的巴黎和会	074
	二、无理敲诈的“金法郎案”	078
	三、大革命时期的中法关系	081
第八章	中国青年在法国追求革命真理	088
	一、赴法勤工俭学的开端	088
	二、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	089
	三、赴法勤工俭学的挫折	090
	四、成立旅法党、团组织	093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法关系	095
	一、中法使节规格升级	095
	二、中国特使出使法国寻求支援	098
	三、抗战爆发法国封锁印度支那过境通道	101
	四、维希政府时期的中法关系	103
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法关系	108
	一、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与法国军队的冲突	108
	二、中法在印度支那独立问题上的斗争	114
	三、法桂勾结残害边境革命武装	121
第十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的两国关系	123
	一、新中国成立初驱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123
	二、国民党政府驻巴黎使领馆起义	127
	三、援越抗法战争	132
	四、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斗争	135
	五、建交前两国各界人士的友好往来	139
第十二章	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44
	一、建交谈判的艰难曲折	144
	二、两国建交是亚洲的“外交核爆炸”	153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国关系一度恶化	160
	四、蓬皮杜总统访华	163
第十三章	两国关系的新发展	168
	一、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	168
	二、九十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困难	179
	三、《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两国关系的修复	183
	四、江泽民主席访法,两国关系又有新发展	188
	五、高层交往频繁,经贸发展迅速	191
第十四章	两国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	197
	一、希拉克总统访华,确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197
	二、落实伙伴关系,合作势头强劲	202
	三、中法密切磋商协调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206
	四、'99 巴黎·中国文化周开幕	207
第十五章	世纪之交的中法关系	209
	一、江泽民主席再次访法	209
	二、中法、中欧关系继续发展	212
	三、局势动荡中法加强联系	217
	四、高层交往密切,合作成果显著	220
第十六章	国际局势再起波澜 中法继续加强全面合作	224
	一、“9·11”后中法领导人热线联系频繁	224
	二、胡锦涛副主席访法,促进合作协调立场	225
	三、法国支持中国申办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228
第十七章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臻成熟	231
	一、关注全球问题,中法、中欧携手合作	231
	二、朱镕基总理访法,为双边关系深化注入新的活力	233
	三、互访频繁,成效显著	235
	四、伊拉克战事再起,中法密切联系协调	

	立场	237
	五、拉法兰总理访华,给抗击“非典”中的 中国人民以莫大鼓舞	241
第十八章	中法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时期	244
	一、推动全面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244
	二、中国文化年在法国举行,中法文明 对话进一步深入	247
	三、胡锦涛主席访法,中法关系史上的 历史性事件	249
	四、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年	254
	五、希拉克总统再访中国,法国文化年 隆重开幕	258
附录一	中法关系大事年表	264
附录二	中法关系主要文件选录	278
附录三	中国驻法国使节表	301
附录四	法国驻中国使节表	303
附录五	主要参考书目	305
	后 记	307

第一章 中法两国的最初交往

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法兰西共和国位于欧洲大陆的西部,濒临大西洋,首都巴黎。大约在公元 5 世纪,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法兰克人中的一部分从北方迁徙到现在的法国境内。公元 843 年,法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其时,东方的中国正处于全盛的唐朝时期。

中法两国地处欧亚大陆的的东西两端,相隔万水千山。古代东西方的交通,除了因交通工具的落后、地理环境的阻隔外,还受到居于欧亚大陆中间的一些国家的阻挠,因而交往十分困难。直至 13 世纪以后,法国人才隐约地知道东方有一个以出产丝绸和瓷器而闻名的文明古国的存在。13 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性远征,建立起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崛起,沟通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虽然这个大帝国不久便因成吉思汗的去世而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汗国,但由于各汗国都注意保护商道,特别是元朝在各地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使得交通大为改善。当时,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蒙古窝阔台汗国首都和林(今乌兰巴托附近)和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首都大都(今北京)、长安(今西安)等大城市商贾云集,外国商人中除了大量的阿拉伯人外,也有不少欧洲人。

11 世纪末以后,罗马教廷组织了多次十字军东征,企图打败横贯于欧亚大陆的伊斯兰教的势力,打开通往东方之路。但是,十字军东征屡遭失败。当成吉思汗崛起之后,西方世界一方面震慑于蒙古的军事威势,愿意与之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则想利用蒙古铁骑夹击伊斯兰势力。1248 年,法王路易九世来到

塞浦路斯准备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听说蒙古大汗对基督教有兴趣,而且还愿意成为教徒,便想策动蒙古军联合攻打埃及。他派遣圣方济各修士安德烈·隆如莫为首的使团,经亚美尼亚、波斯、希瓦,沿里海的南岸和东岸到达大汗大营所在地准噶尔,恰因贵由大汗(定宗)去世,新汗未立,隆如莫只受到摄政的王后傲慢的接见,带回了她给法王的信。信中要求法王每年纳贡,否则将大军压境,毁灭该国。隆如莫受辱无功而归。路易九世侵略埃及失败后,又于1252年派遣圣方济各修士吉尧姆·鲁勃吕克率使团出使蒙古。鲁勃吕克率团从阿克(今以色列境内)出发,经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长途跋涉,于1254年4月到达和林,蒙哥大汗在宫中接见了。鲁勃吕克在和林住了4个月,于同年8月回国,带回了蒙哥大汗给路易九世的复信。

鲁勃吕克虽然未曾到达中国的内地,但通过蒙哥大汗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他获得了有关中国的许多知识,在回国后写了一部游记。这部游记比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早了半个世纪,向欧洲人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使当时的法国人对东方的巨龙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

据鲁勃吕克介绍,中国是一个东临大海、人口众多的国家,欧洲人所传的“丝国”就是中国。他在和林见到许多汉人手工工匠,他们的技术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能超越的,他们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丝绸,会用稻米酿造出美酒……。中国人用毛笔写字和绘画,每个字就像一个图案。他还记叙了中国医生用手指按在脉搏上诊断病症,用草药医治病人的事。中国已经有了纸币,每张像手掌大小,上面盖有大汗的印章,可以在各地使用,等等。鲁勃吕克的游记还对蒙古、维吾尔、西藏、西夏的宗教、信仰、仪式、服装及语言的特点都作了描述。他还描绘了和林的宫殿建筑,在那里经商的阿拉伯人和从事手工艺制作的中国人。他在和林还遇到了一个被蒙古人从东欧俘虏来的法国金匠吉尧姆·布涉。这个金匠手艺高超,为蒙哥大汗制作精巧的器皿。他曾为蒙哥大汗制造了一棵银树,根部伏着4头银狮,每头银狮都能泻出马奶,以供饮用;另有4条管道通到树顶,能分别倾泻出葡萄酒、马奶、甜酒和米酒,树下有4只银碗分别接住。吉尧姆·布涉也许是第一位到达蒙古的法国工匠。^①

鲁勃吕克是幸运的,他回到欧洲后遇见了同为圣方济各会士的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培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引述了鲁勃吕克关于中国情况的描述。从而使这部游记被湮没了300多年后人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

忽必烈于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他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政策,与罗马教廷多次互遣使节通好,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元朝为官多年。1289年,元朝在通使罗马教廷的同时,使节还

^① 参阅克·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持有元朝皇帝给法王菲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的信。这可以说是中法两国之间第一次正式联系。次年,在元朝为官的维吾尔人玛巴琐马曾到罗马和法、英等国游历,在巴黎晋謁过法国的王公大臣。

据法国方面的文献记载,第一个到达“汗巴利克”(即今北京)的法国人是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大主教。

由于元世祖忽必烈不排斥天主教,当时教皇尼克拉四世认为这是向东方传布天主福音的良机,先是派遣意大利人约翰·孟脱—考尔维诺来华传教。1299年,他在大都(北京)建立了一座教堂和一座钟楼,为约6000人施行了洗礼,建立了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的天主教。考尔维诺于1328年在大都去世。1333年9月,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任命法国人尼古拉继任,尼古拉带32人来华赴任。

1368年,元亡于明。大动乱中,尼古拉等去向不明。1370年,教皇命另一巴黎大学教授威廉·伯拉多继任北京大主教,但启程后即下落不明。其后200多年间,在中国大地上鲜见法国人的踪迹。

由于对法兰西和佛朗机(今翻译法兰克)译音的混淆,明末乃至有清一代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曾将法国人与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混为一谈。法兰克是北欧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法兰西为入主法国的一部分法兰克人建立的国家名称。早年伊斯兰教徒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交往,通称欧洲人为“佛朗机人”。葡萄牙殖民者是最早来华的欧洲人,据《明史·佛朗机传》记载,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麻六加总督就遣使来华要求通商,以后葡萄牙人来中国日渐增多。由于葡萄牙人来华之初,多雇佣阿拉伯人为翻译,中国人按照阿拉伯人的称呼,以“佛朗机”通称来华的欧洲人。后人因佛朗机音近法兰西,遂误认为这些人都是法兰西人。夏燮作《明通鉴》称:“佛朗机即今之佛兰西,亦曰法兰西,大西洋欧罗巴之一国也。”魏源、梁廷相等在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著作中也有这样的误解。直至民国编纂的《清史稿》,还因袭此说。由于这种误会,对于法国人何时来华的记载出现了种种说法。《中国与远东》一书的作者布莱克利斯说“法国人于1506年最先来到中国”。著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美国人马士则认为法国人第一次派船来中国是1660年的事情。中国学者胡绳、翦伯赞等对法国人最早来华时间的说法也各不相同。

事实上在中国史籍中有记载可查的第一个来到中国并可以确定是法国人的,是1611年抵达澳门的耶稣会士金尼阁。较早来华的法籍传教士还有亚历山大·罗得(1623年)和巴吕(1664年),他们都是由罗马教皇派遣的。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开始时很少,远远比不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17世纪后半叶,法国殖民势力逐渐在海上占据统治地位。康熙年间,特别是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之后,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逐渐增多,到1773年耶稣会解散止,先后来华的法籍耶

稣会士约 100 余人,占全部来华耶稣会士的 1/5 强。

西方的耶稣会士不避艰险跨洋东来,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推动下,为早期殖民主义服务的。这些传教士除一部分在中国朝廷供职外,足迹遍及中国本部十余省,在中国的士农工商中广交朋友,收录信徒,进行传教活动,并且收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说:“我们耶稣会同人依照本会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①利玛窦还鼓吹发动对中国的“精神战争”,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中国儒家经典来解释西方天主教教义,并硬把两者说成是一致的,同时又容许入教者维持传统的“祭孔祀祖”的习俗,以此来笼络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集团,排除传教的障碍。

来华的耶稣会士除了传教以外,还从事各种科技学术活动。这种情况从明末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到中国开始,一直到清康熙、乾隆朝,都受到中国朝廷的信任和保护。1620 年金尼阁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了教皇保罗五世赠送给中国皇帝的 7 000 余册书籍。这些书籍选择广泛,除神学、哲学书籍外,还有大量的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类书籍。以后,欧洲传教士们将其中一部分译成满、汉文字,供朝廷官员阅读。

对法国来说,派遣传教士来华,除了传播“福音”外,也带有探索东方,发展科学的目的,因而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鼓励和支持。1685 年 3 月,两艘船从法国启程驶往暹罗(今泰国),上面载有若干传教士,其中有 5 人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临行前,路易十四王朝的大臣柯尔伯给他们的指示是:“我愿汝等教士能在传教之余,在各地作各种观察,以使我国科学艺术臻于完善”。传教士们都担负着为法国科学院收集科技资料的任务。5 位传教士既是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他们后来在中国的姓名分别是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白晋。他们随身带来了数学仪器、天文模型、大望远镜等科学仪器。法国传教士的到来,首要目的当然是传教,但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最初活动以及后来陆续来华的传教士的活动,却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形成了中法交往的初次高潮。

二、两国文化交往的初次高潮

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白晋等 5 名法籍耶稣会士于 1685 年 3 月离开法

^① [法]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 1 册,第 1 页。

国,1687年7月23日到达宁波,次年2月7日到达北京。时值清康熙皇帝在位。康熙帝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采取严厉限制措施,只准他们“自行其教”,不准在各地“开堂传教”。但他对西方科学文化采取开明政策,他本人也十分重视学习西方科学,曾请比利时籍传教士南怀仁进宫为教师。南怀仁死后,康熙礼聘张诚、白晋进内廷做老师。张诚等每天早上4时进宫,日落才归,上下午给皇帝各上2小时课,讲授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以及炮术实地演习等课程,历时四五年。

1693年,康熙派白晋为特使回法国,向路易十四赠送礼品,希望法王再派更多精通天文、算法、律吕、绘图和内外医科的教士来华。白晋历经艰辛于1697年抵法,竭力说服路易十四派出驶往中国的第一艘法国商船“昂非德里特号”。白晋率7名法国传教士随船来华,其中著名的有雷孝思、巴多明、马若瑟、杜德美等。以后,法国传教士来华人数日多,著名的还有罗德先、安泰、蒋友仁、宋君荣、汪达洪、杨自新、陆伯嘉、傅圣泽、汤执中、王致诚、韩国英等。

西方传教士除为皇帝服务外,还通过翻译、著述,引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研究介绍中国文化科学,并以自己的知识完成清朝皇帝委托的任务,其中法国传教士功不可没。

法国传教士向中国朝野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在天文学方面,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向清帝详细介绍了伽利略与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地动说。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輿全图》进献乾隆皇帝时,在地图周围布置了天文学内容的插图和说明,介绍地动说和行星运动的新学说。蒋友仁的这部抄本后经中国学者润色,刻印流传。法国传教士还任职钦天监,参与历法的修订。

在医学方面,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用金鸡纳(即奎宁)治愈康熙的疟疾,罗德先为康熙治愈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为教友治病,门庭若市。白晋在宫廷内设有化学实验室,器械设备先进。白晋和巴多明曾将一部外科医学著作《根据血脉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1690年)译成满文,并附有解剖图,康熙让御医学习参考,但却禁止刊印,使此书未能普及。巴多明还曾把一些化学、物理和中毒治疗法的论文译成满文。

在机械钟表方面,法国传教士陆伯嘉在康熙的宫中专门制造钟表和机械装置,杨自新曾献给乾隆一只上了发条能自己行走达百步的机械狮子,后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走三四十步。汪达洪制造了两个能手捧花瓶行走的机器人,还改造了一个英国进献的机器人,使它能写满蒙文字。这些奇异的钟表机械装置最为清帝和王公大臣所喜爱。

与此同时,法国耶稣会士在对中国文化科学的研究和介绍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早期来华的金尼阁根据利玛窦遗留下来的大量资料和笔记,写了一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1615年出版),书中第一次向法国人详细地描述了中华

帝国的全貌,包括各种风土习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别是圣人孔子的言行和儒家经典以及儒学的地位。这部著作对欧洲学者了解中国起了启蒙作用。此后,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又出版了三部介绍中国的巨著:《海外传教耶稣会士书简集》34卷,其中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1702—1773年陆续出版,该书汇集了当时传教士从中国寄回法国的书信,对中国情况有详细描述;《中华帝国全志》,杜赫德主编,共4卷,1735年出版,该书收集传教士写的回忆录,记述中国的地理、历史、朝代、自然等情况,有附图64幅;《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简称《中国论丛》,共16卷,1776—1814年陆续出版。

此外,法国传教士宋君荣、马若瑟等把中国古典经籍《诗》、《书》、《礼》、《易》等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冯秉正把朱熹的《通鉴纲目》改写成法文的《中国通史》;宋君荣根据中国古史中的天文历算写成《中国天文历史》,利用中国史料写成《唐代史》、《成吉思汗与蒙古史》。传教士们将朱熹的《劝学篇》、刘向的《列女传》、《诗经选篇》译成法文,翻译了中国的《养蚕术》、《图注脉诀辨真》、《泉币志》等。他们还把中国的植物品种介绍到法国去,至今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还保存着大量原产中国的植物标本目录和彩图。

传教士们的知识和他们为清朝统治者服务的热忱,博得了清朝皇帝的信任,白晋、张诚还成为康熙的老师。张诚很快学会了汉语、满文,多次充当译员。1687年,张诚与另一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以清朝三品官员的身份,参加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周旋于中俄官员之间,在谈判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707年,康熙皇帝接受张诚的建议,决定测绘一份精密的中国全国地图。翌年7月,他正式任命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冯秉正、德玛诺等主持其事,中国学者何国栋也参加,在全国各地开展实地测绘工作。他们采用西方先进的仪器和绘制技术,在测绘过程中,发现经度的长度上下不同,从而证明地球实际上是扁圆形的,这是对世界地理学的一大贡献,也可以说是中法科学家合作的成果。经9年的实地测绘,最后由雷孝思、白晋、杜德美审定,于1718年绘制完成总图一幅。康熙将其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又称《皇舆全图》、《大内舆图》。全图采用当时先进的以地圆说为基础的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为1:400 000。绘成后,纵横数丈,实为中国地图学史上的创举。《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对这项工程评价很高:“最后所绘成的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①康熙十分喜欢此图,嘉奖了参与测绘此图的传教士们,并于1719年将此图印制颁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地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35页。

布于世,又特命工匠用上好白玉制造一张方桌,在桌面上精工刻凿、用金丝条镶嵌成一幅中国地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此桌落入英军之手,运往上海,后在转运英国途中,因海船失事沉没于地中海。世人从此再也看不到这张珍贵的金镶白玉的地图桌了。

乾隆在修筑圆明园时,畅春园部分仿法国宫殿风格建造,西洋楼委托蒋友仁等设计,中西合璧,宏伟壮观。其中的谐奇趣、蓄水楼、花园、蓄雀笼、方外观、竹亭等 12 处喷水池和白石雕刻,全部模仿路易十四时代的风格,至今尚能看到放置皇帝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及两侧的巴洛克式门廊。

18 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学者和学生钦佩于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在法国传教士的影响下,随他们赴法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赴法的学者和学生。据记载,最早去法国的有黄某、胡约翰、高类思、杨德望等。

黄某(名字不详)是福建兴化人,他于 1679 年受洗皈依天主教,受洗时取名阿尔卡迪奥。1703 年随法国传教士郎洪仁赴法,当时 24 岁。原在修道院深造,因与一法国姑娘有恋情,1712 年被逐出修道院,在巴黎定居,并在皇家图书馆负责编写《汉法字典》和翻译法中外交文件。他与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进行过长谈,详细回答了孟德斯鸠所提的有关中国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治、历史等方面的问题。1716 年病死于巴黎,遗有一女。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有他的日记。

胡约翰于 1722 年随传教士傅圣泽赴法。康熙在傅圣泽回国时,赠送法王路易十五 4 000 册中国书籍,胡约翰在巴黎曾协助向路易十五讲解这些书籍。

高类思和杨德望曾在传教士蒋友仁门下学习三年,1751 年被送到法国继续学习法文、拉丁文和神学十余年。1764 年准备回国前拜访了当时的国务秘书贝尔丹,贝尔丹又留他们继续学习自然科学、绘画和铜版雕刻术。1765 年 1 月,他们离法回国,法国政府赠送他们许多工艺品、新式利器、装饰玻璃、陶瓷、手提印刷机、机械器具、望远镜、显微镜、金表等礼品。离法前,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果向他们提出四大类 52 个问题,请他们回国后调查答复。1766 年 1 月他们回到北京。回国后,与法国传教士合作写成《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论文,以答复杜尔果提出的部分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中法贸易的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法国。中国物品以其质地优良、装饰新奇而风靡法国,成为宫廷和王公贵族争相购买、收藏的珍贵物品。法国王公贵族的家中往往置一密室收藏中国物品,轻易不示人,只在亲密朋友来访或盛大宴会时才打开房门让人一瞥。而且,王公贵族们以谁家收藏的中国物品丰富来炫耀自己的富有,以致来自于遥远东方中国的“舶来品”供不应求。当时一些法国工匠开始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中国趣味”的时尚。这种对中国艺术品样式、构思和装饰的模仿,后来旁

及绘画、建筑和园林,形成了以明快、轻灵、生动、自然为特点的洛可可艺术风格。

17、18 世纪的法国,在艺术上盛行巴洛克风格。这种导源于古罗马的艺术风格,以富丽堂皇、庄严雄伟为特征,但不免刻板 and 形式化。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人要求摆脱专制王权的束缚,与哲学上的思想启蒙运动相呼应,在艺术风格上倡导个性解放,摆脱古典的、呆板的艺术形式。中国艺术品的幽雅、精致、纤巧的风格正好迎合了法国人的要求。洛可可风格在法国延续了数十年,并影响整个欧洲。随着 1755 年意大利庞培城的考古发现,新古典主义兴起,约到 1780 年,洛可可风格才被新古典主义所代替。

17、18 世纪的中法文化交流是中法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它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为中法关系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鸦片战争前的中法贸易

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百二十年的盛世,人口超过 3 亿,国力强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对外交往中并不“吃亏”。自嘉庆、道光两朝后,国势开始下降,进入封建社会的末世。

16 世纪初,法国社会内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与英国相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农业仍是主要经济,因而对发展海外贸易,开拓海外市场的兴趣不大,加上国内忙于统一战争,海外扩张的起步比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要慢得多。到 1661 年,法王路易十四当权后,专制王权加强,国内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支既可用于商业又可用于军事的强大舰队,急欲与欧洲其他国家争霸,同时向海外开拓市场和建立殖民地。为了这一目的,在法国政府的鼓励下设立了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近东公司、北方公司等,在北美的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和西印度群岛拓展殖民地,同时向非洲、印度洋地区和东南亚一带扩张势力。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海上势力削弱的时候,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法国人的触角逐渐伸向中国这个正在走向腐朽没落的封建老大帝国。

法国对东方的贸易在亨利四世(1589—1610 年)时就已提出。黎世留当权时开始重视对华贸易,路易十四时代付诸行动。1660 年法国里昂富商出巨资创建“航行中国、东京、印度支那及附近岛屿之公司”。该公司在荷兰定制一艘三四百吨的船进行远东航行。后该船在德克西尔岛遇风暴沉没,公司因此破产。

1664 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获得在印度及东方诸地包括中国在